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张宝三 杨儒宾 编

日本汉学研究初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 主编 张宝三 杨儒宾 编

日本汉学研究初探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张宝三,杨儒宾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889-2

I. 日… II. ①张…②杨… III. 汉学—研究—日本—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448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日本汉学研究初探》,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250 号

日本汉学研究初探

编 者 张宝三 杨儒宾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李善强
责任校对 胡 静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21.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89-2/B·399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前 言

杨儒宾 张宝三

—

汉学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但汉学却是跨国性的学科,任何现代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已很难闭门造车,他无法将自己局限在中文的圈子里,然后幻想构造出伟大的体系。这种闭门自雄的想法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学术的需求,因为时代的条件不一样了。

我们能够想象:研究中国思想与经济关系的学者,他居然会跳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儒教与道教》两书吗?研究唐宋文化史的学者,他能不考虑内藤湖南的宋代文化之假说吗?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学者,他能够不正视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贡献吗?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他能够忽略史华兹、列文森的论点吗?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学者,他能不正视矢内原忠雄的批判性见解吗?

如果要列的话,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答案显然只有一种:不能。不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学问已不能脱离跨国、跨学科的架构,孤立论述。不管论者喜不喜欢,我们都不能不正视一项事实:即中国打破隔离状态,成为世界的中国以后,中国的学问也就不能再孤芳自赏,它必然会变成世界性的中国学问。同样的一件史实,同样的一件作品,同样的一位思想家,它们在近代以前的意义绝不可能和在近代以后的地位一样。我们试想:

戏曲小说(如《三国》、《水浒》)、女性作品(如女书)、准科学著作(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在今昔地位的变化,即可了解个中三昧。

不能的原因还可反向思考,我们固然同意中国的学问已不能脱离世界性的格局而立论,但任何普遍性的学问如果是普遍性的话,它恐怕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学问的存在。张光直先生说:“中国的历史也同西方一样的惊心动魄,一样的宏伟壮观。但人们还没有把它作为总结普遍规律的研究对象。”话说得很对,张先生的论点绝非出自文化民族主义,我们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中国文明对人类所提供的精神遗产之丰富,我们即很难想象:完全撇开中国文化的因素不谈,这样建构出来的理论还能是普遍性的吗?

也正因中国文化是构成人类经验极重要的一环,所以如何适时而又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学问,此事遂不仅止于狭隘的中国学问之领域,它的意义深远多了。而如何适时而又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此事又得回到问题的原点,此即我们身处今日,不得不具备跨学科与跨国别的学术眼光。

二

汉学无疑已是国际性的学问,但比较之下,以日、韩为主的东亚汉学研究尤其值得重视。美国的汉学研究史再怎么宽松地计算,其时间都不出一两百年;欧洲的汉学研究历史当然长一点,但比较成气候地了解中国思想与风土,其年代恐怕也要迟至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以后,欧洲与中国才算有了对话。日、韩的情况不同,如果我们对汉学采取广义的定义的话,那么,日、韩两国的汉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研究,因为汉学构成了两国文化的重要内涵,日、韩是广义的汉文化圈的成员,它们越了解汉文化,也就是越了解它们自己。甘乃迪欢迎希腊政治领袖时说:“我们都是希腊人。”如果大家不死抱政治字典,咬文嚼字,那么,甘乃迪的话并不难了解。

“日本汉学”应该可以从两方面了解,广义来讲,此词可以指汉学传到日

本,并本土化以后,形成独立发展的学问。比如日本汉学、日本儒学、日本书法等等的概念,这种日本的汉学虽然可以说移植自中土,但分家以后,它们茁壮成长,甚至发展出自己的问题意识与表达形式,其面貌和中国的母体可以相去甚远,它们与原先的母体思想之异同——就如中国大乘佛教之于印度小乘佛教一样——特别值得玩味。

“日本汉学”的另一个定义是将“汉学”限定在中国学问的范围内,这样的汉学是国别归属的概念,是区域研究的概念,这个词语意指日本人所研究的中国学问。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和日本关系极为密切,举凡学术语词的引介、传统知识与现代学问的接榫,以及知识体系之定位等等,这些大建构无一不和日本学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中一衣带水,本世纪初的中国学术巨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少人没有日本经验,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无一不然,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日人研究中国学问起步既早,涉入亦深,他们的汉学研究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内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它们的文化原本即带有大量汉文化的因子,因此,日人的汉学研究成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三

本书收录的论文都已在公元2001年3月16日、17日台大中文系、台湾清大中文系及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宣读完后,原作者根据讲评及与会学者的讨论修改,再经编辑委员审核,最后才定稿。

这次会议在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举行。我们选择在台大开会,具有特殊的用意。二次大战结束前,台大沦为日本帝国大学之一,它拥有台湾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日本汉学资源与历史记忆。台湾的政治历史颇多断层,但学术不容有断层,尤其“汉学”这个和台、日两地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共同文化资产,更不宜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场中,扭曲掉它原有的面貌。

我们希望就文化论文化,让东亚地区共通的底层文化可以有公平发声的机会。

鉴于汉学不只是门国际性的学问,连“日本汉学”也由附庸蔚为大国,它具备了国际性的学问之特质,可惜,台湾学界对此议题涉入不深,国外学界专门为讨论“日本汉学”而召开的会议也极少听到,所以我们觉得在台湾首度召开“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极为深远。它不仅具有传播新学术领域的知识之功能,还有唤醒台湾学界正视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邻邦的研究成绩的作用。在邀请与会学者参与时,我们希望能将眼光放大,所以我们除了邀请海峡两岸的学者与会外,也邀请了韩国、德国及日本的学者共襄盛举。我们邀请的对象,学术是决定性的考量,但我们也考虑到会议主题及各校学风的差异,所以邀请对象多元化,我们希望能尽量达到平衡各种论点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于具运动性意义,所以我们的范围定得较为广泛,广义的与狭义的日本汉学研究皆包括在内,以利各界共同参与讨论。我们将论文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郑清茂教授的引论,郑教授宏观地勾勒出“日本汉学”此观念的内涵,其论点具指标意义。

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论文分别探讨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的问题,这两部分的论文篇幅最多,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轴。李庆及林庆彰两位教授的论文按传统的归类,属于经学,经学自然是儒学的一部分;陈玮芬与杨儒宾的论文隐约之间有比较中、日儒家思想史的意味;中嶋隆藏教授的论文严格说来不局限在儒学上面,但儒家特重历史意识,方便说来,我们似可将中嶋教授的论文归入“儒学思想的受纳”此一部门。“中国文学的回响”此部门收有五篇论文,金文京、斋藤茂及小峰和明三位教授的论文偏向于文献的引介与诠释。中、日两国交流时间特长,中国文献流落日本者不知凡几,类似的文献考古学工作还大有发展的空间。陈明姿及川合康三两教授做的工作比较像“影响的研究”,国内能触及平安文学的学者极少,遑论研究?陈教授的论文大有开疆拓土之功。川合教授的论文进路比较特别,此文似有“心态史”的意味,他由“堕泪碑”引发联想,并论及后人对此一主题的看法,叙述的

工作做得很细腻,所以我们也将它收入“中国文学的回响”此一版块。

中、日两国隔洋相望,但海洋从来不是阻碍沟通的深渊,而是促进文化交流与商业往来的通衢大道。有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引发的诸多子题,这是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值得再三讨论。我们的会议虽然将焦点置于“日本汉学”上面,但很难不触及“中、日交流”这个影响深远的议题。新世纪伊始,东亚关系揭开新貌,我们在会议场次上设定此一主题,这应当是有意义的。

目 录

前言	杨儒宾 张宝三	1
一、引论		
他山之石:日本汉学对华人的意义	郑清茂	1
二、儒学思想的受纳		
日本近代的《诗经》研究:以《十月之交》为中心	李 庆	13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的解经方法	林庆彰	37
“天命”与“国体”:近代日本孔教论者的天命说	陈玮芬	58
叶适与荻生徂徠	杨儒宾	88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所蕴含的问题意识:以一九六〇 年代初期的时间论争为中心	中嶋隆藏著 陈玮芬译	114
三、中国文学的回响		
日本平安初期物语对中国文学之受容	陈明姿	128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元朝郭居敬撰《百香诗选》等四种百咏诗 简考	金文京	147
《敦煌愿文集》与日本中世纪唱导资料	小峰和明著 陈静慧译	155
岷山之泪:羊祜“堕泪碑”的继承	川合康三著 朱秋而译	163

关于残存在日本的唐诗资料	斋藤茂	176
--------------------	-----	-----

四、东亚文化交流史

淡海三船与东亚的诗文书籍交流	王 勇	186
关于日本汉文学历史展开之一考察：与韩国汉文学作 比较	沈庆昊著 金培懿译	208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 ...	黄俊杰	229
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时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	张宝三	265
明治时期汉学私塾之教育功能	Margaret Mehl 著 陈玮芬译	287
名词索引		307
人名索引		312

他山之石：日本汉学对华人的意义

郑清茂*

今天有这么多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聚在一起，举行这次“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实在是个非常难得的盛事。据我所知，专为“日本汉学”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不但在台湾，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在这里，我要向合办这次会议的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汉学研究中心，表示由衷的感谢。更要对各位筹备委员的高瞻远瞩，辛苦劳累，致以无上的敬意。日本已故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先生，曾经在一首诗里说：“愿逢四海为家日，赵瑟秦声共一堂。”^①虽然吉川先生四海为一家的愿望尚未能完全实现，但至少今天从不同国家来了这么多贵客，共聚一堂，研讨吉川先生奉献其一生的学术领域，如果他老人家天上有知，可能也会颌首微笑，表示肯定吧。

众所皆知，一般所谓汉学是研究中国文化或文明的学问，属于区域性研究（area studies），大约相当于英文的 sinology 或较现代的 Chinese studies。大凡中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经学、历史、政治、社会，甚至文物考古、风俗习惯等，只要与中国有关的题材，都是汉学的研究对象。在日本，则自明治时代开始，或称之为支那学；而在近半世纪以来，又称之为中国学。^②

* 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① 《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68—1970年），第20卷，页520。诗题《大阪艺术祭中国歌舞团绝句四首》之四（1958年），原收录《知非集》甲。以下引《吉川幸次郎全集》均简称《全集》。

② 关于汉学及相关名称，如汉文学、儒学、儒教、东洋史、东方学、支那学、支那文学等等，请参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特别是页1—2、42—43；户川芳郎：《汉学ジナ学の沿革とその問題点——近代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と中国研究の系譜（二）》，（转下页）

日本的汉学,由于特殊的地缘与历史背景,较之西方诸国,不但更为悠久,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而且范围更加广泛,门类更加繁多,很难一言以蔽之。譬如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所包括的三个子题:第一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第二是日本传统汉学汉文学研究;第三是中日文化关系或学术交流研究。其中,第一项是属于世界性的普遍范畴,纯粹以中国文化为研究的对象,可以归为国际汉学的日本学派。第三项的文化或学术的交流,属于广义的比较研究,也是各国汉学家可以讨论的共同课题。只有第二项的传统汉学汉文学,却是日本所特有的。(或可加上韩国与越南,但不在本次会议范围之内。)

下面我想就上面所举的三个子题,根据个人极为有限而浅陋的有关资讯,从一个华人的观点,回顾一下日本汉学的沿革与业绩,及其对华人汉学界的意义。然后,还想附带地谈谈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学术风范,借以反躬自省,表示个人对这位汉学大师的无限感念之情。老实说,今天我在这里作这个主题演讲,总觉得有点僭越而感到相当惶恐;因为严格地说我自己并不是日本汉学的专家,至多只能说是个在长年累月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有缘接触到日本汉学家的一些著作,受到启发或冲击,而获得了不少益处的人。还有一点要声明的,由于我本人的主要兴趣在文学方面,对于其他分野所知有限,所以今天所谈的,尽管无意以偏概全,但是恐怕也难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缺憾。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匡我不逮,不吝指教。

先谈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明治年间(1868-1912)是传统的日本汉学转形为近代的日本支那学或中国学的过渡时期。明治维新之后,根据“五个条御誓文”(1868)中“广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的精神,日本开始转向西方寻求所谓“文明开化”的灵感与“富国强兵”的良策,在“举国一致”的体制下,积极地在各方面展开了现代化运动。包括汉学在内的学术教育界也不例外。当时有一批具有传统汉学素养的年轻书生,也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不甘故步自封,发出振衰起敝、力图自强的呼声。例如明治二十八年(1895,光

(接上页)《理想》397号(1966年),页8-25;陈玮芬:《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会”と“孔子教”を軸として》(福冈:九州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2章等等。

绪二十一年)在《帝国文学》第一卷第二号上,一篇不署名而题为《現今の漢学》的短文里,就有慷慨激昂的发言,择引如下:

衰哉世之所谓汉学家,吁!彼等今何所为?又欲何所为哉?若终以训诂释义或比拟考索为汉学之能事,是不知十九世纪之学问者也。……支那民族之思想乃吾人极需关注者,如从文明史上或语言学上比较阐究之,岂非一大快事?每想今日西洋所谓支那学者(sinologue)之徒,隔洋之东西,如何尽瘁于此,则我邦汉学家宜蹴枕而起;盖我卧榻已容他人鼾睡其中矣,非耶?无须多言,支那学是也。此二千年来支配我国民之思想者,非已成日本学而何?西洋学者难于解读汉文,故欲使其博学多识,盖不可能。是以凭一己之习气,漫作概括性之臆断,而陷于谬误者甚多。今日及未来,能充当此任者,除我日本人,世界中又有何处可以求之?……今日在少壮有为之汉学家哲学家之间,支那学之科学化研究运动,大有兴起之势,可谓我学术界之一大庆幸。^①

从这篇宣言式的文章里,不但可以看出明治中期日本年轻支那学者的抱负、愿景与使命感,而且也看到他们急于摆脱传统汉学的局限,企图把汉学变成科学化现代化学术领域的努力。据说,后来成为京都支那学派创始人的狩野直喜(1868-1947),就是当时《帝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之一。^②

有趣的是明治年间开始崭露头角的支那学者,大多有留学或游历欧洲的经验,也多有访问考察清国的机会。他们受到西方汉学的启迪与激励,也看到西方汉学的长处与缺失,而产生了分庭抗礼、一比高下的雄心壮志。结果是相当丰硕的。就中国文学研究为例,最明显的成绩是文学史的著述。一般人认为世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 Herbert A. Giles 在 1901 年

① 引自户川芳郎:《漢学シナ学の沿革とその問題点——近代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と中国研究の系譜(二)》,页 19。本文所引中译,均出自笔者。

② 同前注户川芳郎一文,页 18-19。

出版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但事实上, 早在 1882 年 (明治十五年, 光绪八年), 日本学者末松谦澄就出版了《支那古文学略史》。虽然这本书的重点在儒家与诸子的概说与批判, 严格地说, 不能算是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之作, 但能提出“文学史”这个概念, 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仍是功不可没的。

其后十五年, 古城贞吉 (1866 - 1949) 出版了《支那文学史》(1897), 是一本称得上近代意义的文学史专门著作。从此以后, 类似的论著接连而来。举其要者, 如笹川临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1897) 与《支那文学史》(1898)、藤田丰八等五人合撰的《支那文学大纲》十六卷 (1897 - 1904)、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 (古代篇)》(1905) 与《支那文学史纲》(1912)、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 等, 不下十种。这些文学史的特色之一是除了传统的诗文之外, 也都重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论述。^① 明治时代在日本中国学史上, 的确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而且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说:

明治以后的日本文明, 展示了一些新的成果。其大者之一是在东方的, 特别是中国的文明历史的研究上, 从江戸时代汉学的偏狭、独断与散漫中, 摆脱出来, 树立了新的体系以及正确的认识。这些业绩的取得每每先于中国本土或西洋。^②

这段话并无言过其实之处。事实上, 这些明治时代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著作, 经过翻译、改编或介绍, 对民国初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教学, 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进入大正 (1912 - 1926) 以后, 日本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 不但在理论与方法上继续推陈出新, 而且在范围上也愈加广泛。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 包括各种文类、个别作家、专书或作品, 都变成了探讨的对象。

① 关于明治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详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 页 341 - 371;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全集》, 第 17 卷, 页 388 - 396。

② 《“東洋学の創始者たち”序》,《全集》, 第 25 卷, 页 250。

在方式上则有评释、译注、概论、批评、断代史或通史、全集或大系的编纂等。在学风上则“京大继承了清朝的考证学，重视数据的斟酌、新资料的发现、作品的精密解读；又在元曲研究上参考了法国人的论著之类，强调科学主义的立场。尔来，东大是在汉学的传统上加以西洋文学的方法论；京大则是清朝的考证学加欧洲的东洋学。东西各自保其学风，作为我国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除了核心的东大、京大之外，在其他公私立大学如东北大学、九州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也开始设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中国学的课程，培养人材，进行研究，成绩斐然。譬如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考》（1920）、狩野直喜的《支那学文薮》（1927）、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1930）、《支那文学思想史》（1943）、《支那文学艺术考》（1942）、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1936）、长泽规矩也的《支那学术文艺史》（1938），为数甚多，不胜枚举。到了第二次大战之后，现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盛行起来，而且开始进入大学课程之中，俨然与古典文学形成并驾之势。^②或许可以说，抢先把中国新文学拿来当作严肃的题材而进行学术研究的，就是日本学者。至于时下渐成显学的台湾文学研究，似乎也是由日本人当了开路先锋。至少他们的参与已经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③

以上，我只简单地介绍了自明治以来，约一百三十年间，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主要业绩。至于其他领域，如哲学或思想史、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方面，日本学者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面对着日本研究中国的努力与成就，学术固然无国界，我们华人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日本传统的汉学与汉文学，不过，在这里，我只想集中讨论“汉文学”的问题。为了方便，可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是汉文学的内涵；第二是汉文学的研究。我个人认为日本的汉文学，简言之，就是日本人

①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全集》，第17卷，页396。

② 详参同前注，页397-420；严绍瑗：《日本中国学史》，页372-423、475-522。

③ 较早的有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の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年），页154-318。较近的有下村作次郎等编：《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冈崎郁子：《台湾文学——異端の系譜》（东京：田畑書房，1996年）等。又参黄英哲编：《台湾文学研究在日本》（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